

論“一國兩制”實踐的三個統一

興 國*

1984年12月，中英兩國政府就解決香港問題達成協議後，鄧小平在會見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的談話中講到：“如果‘一國兩制’的構想是一個對國際上有意義的想法的話，那要歸功於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用毛澤東主席的話來講就是實事求是。”¹ 在這裏，鄧小平特別強調了中國創造性地提出“一國兩制”構想所堅持的指導思想，指出了“一國兩制”是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成果。

隨着香港和澳門回歸祖國，“一國兩制”進入到了實踐階段。“一國兩制”實踐展示了其豐富多彩的特點，也出現了一些未曾預料到的問題。深刻認識“一國兩制”實踐中遇到的種種矛盾和問題，切實把握“一國兩制”實踐的規律，是新形勢下的緊迫任務，而做好這項工作最關鍵最根本的，仍是要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這一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破解新矛盾新問題。

按照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觀點，“物質存在具有無限複雜的多樣性和豐富多彩的運動形式；物質世界處在永恆的運動、變化、發展之中；時間與空間是運動着的物質的存在形式；物質運動有着自身的客觀規律；意識是物質高度發展的產物。”² 對立統一規律、質量互變規律和否定之否定規律是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的三個基本規律，任何事物都是作為矛盾統一體而存在的，矛盾是事物發展的源泉和動力。矛盾存在於一切事物中，並且貫穿於事物發展過程的始終，即矛盾無處不在，矛盾無時不有，等等。如果將“一

國兩制”作為一個社會存在形態和歷史發展過程，它生動地反映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這些觀點和判斷，因此我們應當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方法來分析問題，把握規律，不斷增強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的自覺性。

一、“一國兩制”實踐的原則性與靈活性的統一

馬克思主義哲學所講的原則性，是指人們對於必須堅持的原則所持有明確而堅定的態度。而其中的“原則”是指，處理問題時所必須堅持和遵循的準繩。原則具有真理性、全局性、普遍適用性等特點，一般講，它是經過長期實踐所整理出來的合理化的現象。這些原則既體現着最廣大的人民群眾的當前利益，又代表着他們的長遠利益。原則一般都集中地體現事物的本質，事物的本質具有內在的穩定性，因此原則亦帶有穩定性和持久性的特點。靈活性則是人們在處理問題時所表現出來的“隨機應變”，即根據不同的具體情況因地制宜地採用與一般習慣不同的做法。靈活性具有現實的具體性、多樣性、暫時性、變通性等特點。靈活性總是建立在對具體情況實行具體分析基礎之上的，是從實際出發針對具體情況所採取的變通性措施。靈活性可以防止簡單、僵化地處理問題，充分調動各自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避免“惟上”、“惟書”、“一刀切”等傾向。原則性和靈活性雖然表現為主觀的意識形式，但它們並不是主

* 西南交通大學博士研究生

觀自生的東西，而是有着現實的客觀依據和深刻的哲學理論基礎的。唯物辯證法認為，任何事物及其矛盾都是共性和個性、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統一體。原則性所反映的是事物的共同本質、一般規律，主要解決的是矛盾的共性、普遍性問題。而靈活性所反映的則是事物的個性，主要解決的是矛盾的特殊性問題。事物的共性和個性、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是相互聯結的，因而反映這一關係的原則性和靈活性也是互相聯繫的。離開原則性的靈活性，會使事物發展偏離方向，而離開靈活性的原則性，就會將原則性成為了沒有實際內容的空洞的抽象，不能在解決實際問題中真正體現出來。

“一國兩制”實踐的大原則就是“一國”在先，“一國”是實行“兩制”的前提和基礎，“兩制”從屬和派生於“一國”，並統一於“一國”之內。“一國兩制”是一個完整的概念。“一國”是指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是國家不可分離的部分，是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的地方行政區域。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單一制國家，中央政府對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在內的所有地方行政區域擁有全面管治權。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權不是固有的，其惟一來源是中央授權。特別行政區享有的高度自治權不是完全自治，也不是分權，而是中央授予的地方事務管理權。高度自治權的限度在於中央授予多少權力，特別行政區就享有多少權力，不存在“剩餘權力”。堅持“一國”原則，就是要尊重國家實行的憲法規定的國家的根本制度以及其他制度和原則，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兩制”是指在“一國”之內，國家主體實行社會主義制度，香港等某些區域實行資本主義制度。

“一國”之內的“兩制”並非等量齊觀，國家的主體必須實行社會主義制度，這是不會改變的。國家主體堅持社會主義制度，是香港、澳門實行資本主義制度，保持繁榮穩定的前提和保障。

在“一國兩制”實踐中，在堅持“一國”的前提下，也要始終堅持尊重“兩制”。作為國家主體，在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同時，要尊重和包容香港、澳門實行的資本主義制度，充分照顧到香港、澳門地區的歷史和現實情況，保持其資本主義制度長期不變，依

照基本法實行“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並可借鑒香港、澳門在經濟發展和社會管理等方面的成功經驗。香港和澳門則應在堅持“一國”原則的前提下，充分尊重國家主體實行的社會主義制度。事實證明，在“一個國家”之內，“兩種制度”只有相互尊重，相互借鑒，才能和諧並存，共同發展。

在“一國”之內實行兩制共存，共同發展，實質是兩種制度的“和平共處”。“和平共處”是列寧根據十月革命勝利後，就社會主義國家如何正確處理與帝國主義國家的關係而首先提出的一項重要原則，它主張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可以和平共處。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與印度等發展中國家共同倡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即：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它得到世界各國的普遍支持與贊同，其後更成為國際社會所普遍認同的處理國與國之間相互關係的準則。它既是中國外交的指導原則，也是現代國際法的最基本原則。然而，這一處理國家關係的原則，用於處理社會主義國家內部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種制度之間的關係，這在理論和實踐上都沒有先例可循。“一國兩制”將“和平共處”的思想用於解決一個國家內部的歷史遺留問題上，拓寬了“和平共處”概念的外延。1984年鄧小平指出：“處理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最好的方式。”“現在進一步考慮，和平共處的原則用之於解決一個國家內部的某些問題，恐怕也是一個好辦法。根據中國自己的實踐，我們提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辦法來解決中國的統一問題，這也是一種和平共處。”³

在一個國家的前提基礎上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和平共處，會不會影響到國家的主權呢？實踐證明，國家主權是指一個國家獨立自主處理自己內外事務，管理自己國家的最高權力，是國家區別於其他社會集團的特殊屬性。“一國兩制”在處理主權問題方面的特色主要體現在以下兩點：一是堅持了傳統主權理論中對外獨立性，強調國家主權的獨立完整與不可侵犯，香港和澳門回歸後，涉及特別行政區的外交事務始終作為中央的權力，由中央來負責。二是發展了傳統主權理論中對內規範性功能，豐富了主權實踐方式。按照基本法的規定，中央授權特別行政區實行高

度自治，自行處理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範圍內的事務，諸如發行貨幣權、司法終審權之類傳統上屬於主權範疇的權力賦予地方政府行使，意味着諸多體現主權內涵的具體權利(力)亦實行了一定程度的分解，由地方政府行使。這一分解並不意味着國家主權的消解，恰恰相反，這是國家主權在特別地區的具體體現。⁴ 這裏生動體現了原則性與靈活性的統一。

二、“一國兩制”實踐的 同一性和鬥爭性的統一

唯物辯證法認為，事物之間或事物內部諸要素之間是對立統一的關係。即有同一性的一面，即矛盾雙方相互依存，互為條件，共處於一個統一體中，對立面之間相互滲透、相互貫通；又有鬥爭性的一面，即矛盾雙方相互排斥、相互衝突、相互否定、相互離異。矛盾的同一性和鬥爭性又是相互聯結的。任何一個矛盾總是既具有同一性，又具有鬥爭性。同一之中有鬥爭，沒有鬥爭性就沒有同一性；沒有矛盾雙方的相互差異、相互對立、相互鬥爭，也就談不上矛盾雙方的相互依存、相互貫通。“一國兩制”構想準確地把握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這些原理，針對中國這個矛盾的統一體中，存在着大陸與台灣、香港、澳門兩種社會制度的差異或者說是彼此的對立與鬥爭，同時這個矛盾的統一體中存在着同一性，即台灣和香港、澳門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部分，廣大台灣同胞、港澳同胞都希望實現祖國的統一的現實情況，遵循唯物辯證法關於矛盾鬥爭性和同一性相統一的原理，令矛盾雙方共處在一個統一體中，即為實現國家統一，在堅持一個中國的前提下，在大陸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同時，保留香港和澳門原有的社會制度不變，“你不吃掉我，我也不吃掉你”，矛盾的雙方互相關係，互相合作，和平競爭，共同發展。

求同存異，是“一國兩制”理論的基本內涵，也是“一國兩制”實踐的重要指導原則。香港和澳門回歸祖國以後，在經濟上實現了實行不同社會制度的地區優勢互補，共同發展。尤其是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程中，中國共產黨在思想理論上的對社會主義

本質認識的飛躍，為兩種制度相互尊重、相互借鑒創造了有利條件。鄧小平就此有一系列重要論述，強調“必須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鑒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管理方法”⁵，強調“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⁶“證券、股市，這些東西究竟好不好，有沒有危險，是不是資本主義獨有的東西，社會主義能不能用？允許看，但要堅決地試。”⁷ 這些思想認識上的飛躍，為兩制下的國家主體與港澳地區的經濟合作掃除了許多障礙。兩地以“一個國家”為紐帶聯繫起來，優勢互補、共同發展，積累了在國家發展的整體戰略下，不同社會制度地區，共同借助國家發展機遇獲得發展的寶貴經驗，也積累了不同社會制度的地區間以平等互利為原則深化合作的新經驗。

在政治上的求同存異，則主體體現在包括港澳同胞在內的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綫不斷擴大。統一戰綫是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革命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的基本精髓是以工作指導思想上堅持矛盾的同一性和鬥爭性的統一，求同存異。為實現無產階級的政治目標，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形成最廣泛的政治聯盟。建立統一戰綫，是馬克思、恩格斯 1848 年在《共產黨宣言》中提出的重要思想。列寧在領導俄國人民的革命鬥爭中，進一步論述了統一戰綫的重要性、廣泛性和長期性。馬克思、列寧所論述的統一戰綫，是由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組織和領導的統一戰綫，是無產階級為了實現各個時期特定的戰略目標和任務，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指導下，團結本階級各個階層和政治派別，並同其他階級、階層、政黨及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在一定的共同目標下結成的政治聯盟。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長期的統一戰綫實踐中，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原理與中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逐步總結出一套具有中國特色的統一戰綫理論和政策。中國共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領導集體，在醞釀和形成“一國兩制”構想的同時，開始思考新形勢下的

統一戰綫問題。鄧小平發表一系列講話，闡述新形勢的統一戰綫。1979年6月15日，鄧小平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五屆全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上的開幕詞中講道：“我國的統一戰綫已經成為工人階級領導的、工農聯盟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勞動者和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的廣泛聯盟。”⁸在這裏鄧小平第一次提出“社會主義勞動者”和“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的範疇，同時第一次提出“愛國統一戰綫”的概念。1980年8月28日在五屆全國委員會第三次會議開幕詞中，鄧小平再次強調：“我國革命的愛國的統一戰綫具有空前的廣泛性，它在社會主義和愛國主義的基礎上更加鞏固和發展了。我們要進一步加強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和擁護祖國統一的愛國者的廣泛團結，使我國統一戰綫和人民政協在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實踐中，作出積極的貢獻。”⁹香港、澳門回歸後，統一戰綫工作不斷深化，統一戰綫不再僅僅是過去意義上的階級聯盟，而是發展成為工人階級領導的、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和擁護祖國統一的愛國者的聯盟，是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綫。新時期的統一戰綫從範圍上由內地擴大到了海外，並將一大批台灣、香港、澳門和海外的不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納入了其中。在愛國主義的旗幟下，最大範圍地團結了廣大港澳同胞，共同為特別行政區的繁榮穩定和民族振興而奮鬥，體現了唯物辯證法的“同一性與鬥爭性的統一”。

三、“一國兩制”實踐的 兩點論和重點論的統一

唯物辯證法認為，事物在矛盾運動過程中，既有主要矛盾，又有次要矛盾，主要矛盾在事物發展中居於支配的地位，起着規定或影響其他矛盾的作用，其他矛盾則是非主要矛盾；在事物矛盾體系中，非主要矛盾雖然受主要矛盾的支配和規定，但它並不是消極被動的因素，可以影響和制約着主要矛盾。而一對矛盾中，既有矛盾的主要方面，又有矛盾的次要方面。因此，在研究處理問題時，既要抓住主要矛盾，又要

注意次要矛盾，既要注意矛盾的主要方面，又要注意矛盾的次要方面，二者不可偏頗，這就是兩點論。同時，在事物或過程的多種矛盾中，各種矛盾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平衡的，亦應堅持“重點論”。重點論是與均衡論相對立的，堅持重點論就是在研究複雜事物的發展進程時，着重地把握它的主要矛盾；在研究任何一種具體的矛盾時，要着重把握它的主要方面，而不是平均使用力量，使問題得不到解決。

“一國兩制”構想的提出，緊緊抓住了事物的主要矛盾。從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執政的使命角度講，解決台灣、香港和澳門問題，是全世界的華僑華人、港澳同胞、台灣同胞在內的全體中華兒女的願望，是中華民族走向復興的歷史進程中不可迴避的問題，在國際國內形勢出現有利於和平方式解決上述歷史遺留問題的條件時，中國共產黨及時提出希望以“一國兩制”的方式，通過談判的方式來解決歷史遺留的問題。這不僅深得人民的擁護，也是對歷史的負責任的交待，展示了中國共產黨以國家和人民根本利益為依歸的宗旨。

按照“一國兩制”的構想，成功實踐“一國兩制”的關鍵，是把自己的事情辦好。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在推進以“一國兩制”方式實現國家統一的進程中，國家始終將國家主權的建設發展擺在首位，通過發展自己來為實現國家統一奠定堅實基礎，進而推動統一進程。鄧小平說：“要堅持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綫、方針、政策，關鍵是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基本路綫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只有堅持這條路綫，人民才會相信你，擁護你。”¹⁰圍繞國家建設發展，中共十三大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制定了中國共產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綫，規定分三步走實現現代化的戰略部署；中共十四大確立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指導地位，明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¹¹中共十六大提出，要鞏固和發展已經初步達到的小康水平，到建黨一百年時，建成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¹²中共十八大提出要準確判斷重要戰略機遇期內涵和條件的變化，全面把握機遇，沉着

應對挑戰，贏得主動，贏得優勢，贏得未來，確保到2020年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宏偉目標。¹³ 這些都對全國人民形成極大的鼓舞，也令全世界對中國的持續穩定健康發展更為拭目以待，回答了中國發展和實現“一國兩制”、國家統一的關鍵問題。改革開放以來，由於大陸與台灣、香港、澳門的經濟差距在逐步縮小，因經濟原因對國家統一進程的影響在逐步地減小，國家和平統一和民族的全面振興展示出了更加美好的前景。

堅持“兩點論”和“重點論”，用最大的力量解決最為突出的問題，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在不同階段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是在變化的，因此在事物發展的每一階段，都必須把事物發展的主要矛盾、非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把握好，統籌兼顧，穩妥處理。

比如在香港回歸的中央談判問題上，主權問題是關鍵，1982年9月24日鄧小平在會見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時明確指出：“主權問題不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現在時機已經成熟了，應該明確肯定：一九九七年中國將收回香港。就是說，中國要收回的不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島、九龍。中國和英國就是在這個前提下來進行談判，商討解決香港問題的方式和辦法，如果中國在一九九七年，也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四十八年後還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個中國領導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國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國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國領導人是李鴻章！我們等待了三十二年，再加上十五年，就是四十八年，我們是在人民充分信賴的基礎上才能如此長期等待的。如果十五年後還不收回，人民就沒有理由信任我們，任何中國政府都應該下野，自動退出政治舞台，沒有別的選擇。所以，現在，當然不是今天，但也不遲於一、二年的時間，中國就要正式宣佈收回香港這個決策。我們可以再等一、二年宣佈，但肯定不能拖延更長的時間了。”¹⁴ 在中英香港談判結束後，香港回歸的過渡期中一些勢力的干擾將成為一個突出問題，鄧小平指出：“對於中英聯合聲明，我們不僅相信我們自己會遵守，也相信英國人會遵守，更相信香港同胞會遵守。但是應該想到，總會有些人不打算徹底執行。某種動亂的因素，

搗亂的因素，不安定的因素，是會有的。老實說，這樣的因素不會來自北京，卻不能排除存在於香港內部，也不能排除來自某種國際力量。”¹⁵ 這就為各種干擾勢力的活動嚴肅地敲響了警鐘。在起草香港基本法過程中，特區的政治體制是一個影響到全局的重要問題，鄧小平也指出，香港的制度不能完全西化，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他說：“香港現在就不是實行英國的制度、美國的制度，這樣也過了一個半世紀了。現在如果完全照搬，比如搞三權分立，搞英美的議會制度，並以此來判斷是否民主，恐怕不適宜。對這個問題，請大家坐在一塊深思熟慮地想一下。”¹⁶ 他說：“現在香港的政治制度就不是實行英國的制度、美國的制度，今後也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如果硬要照搬，造成動亂，那是很不利的。這是個非常實際的嚴重問題。”¹⁷ 鄧小平的這些重要論斷，至今對“一國兩制”實踐仍在產生着重要的指導意義。

香港和澳門回歸祖國後，在國際國內大環境、大背景下，香港和澳門在經濟和社會發展中遇到一些新情況、新問題。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戰勝了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世界性金融危機的挑戰，戰勝了2003年的“非典”疫情，同時針對外部勢力對“一國兩制”實踐的干擾和一些人還沒有完全適應港澳回歸後實行“一國兩制”這一重大歷史轉折，特別是有一些人對“一國兩制”方針政策和基本法還有模糊認識和片面理解的情況，開展有針對性的工作，這些都體現了在推進“一國兩制”實踐中，堅持兩點論和重點論的工作方法，從而為“一國兩制”實踐積累了寶貴經驗。

四、小結

馬克思主義哲學是關於自然、社會和人類思維發展一般規律的學說，是在深刻分析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趨勢和科學總結工人階級鬥爭實踐的基礎上，創立並發展起來的，它堅持唯物論和辯證法的統一，堅持唯物主義自然觀和歷史觀的統一，是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馬克思主義儘管誕生在一百多年之前，但歷史和現實都證明它是科學的理論，迄今依然有着

強大生命力。

“一國兩制”構想和方針遵循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這一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從實際出發，對解決複雜歷史遺留問題進行了創造性的探索，成為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成果，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為“一國兩制”實踐指明了方向。

然而，“一國兩制”實踐是豐富多彩的，在這個實踐中，必須始終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注意把握和遵循事物運動發展的規律，全面準確地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這樣就會不斷破解“一國兩制”實踐中遇到的新矛盾新問題，推進“一國兩制”實踐的穩步健康發展。

註釋：

- ¹ 鄧小平：《中國是信守承諾的》，載於《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01頁。
- ² 見《中國大百科全書(精裝本)》第十二卷，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9年，第269頁。
- ³ 鄧小平：《和平共處原則具有強大生命力》，載於《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96頁。
- ⁴ 楊允中等：《“一國兩制”理論探析》，澳門：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2012年，第144-145頁。
- ⁵ 鄧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載於《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3頁。
- ⁶ 同上註。
- ⁷ 同上註。
- ⁸ 鄧小平：《新時期的統一戰綫和人民政協的任務》，載於《鄧小平文選》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96頁。
- ⁹ 鄧小平：《統一戰綫和人民政協要為發揮社會主義優越性作出貢獻》，載於《鄧小平論統一戰綫》，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第239頁。
- ¹⁰ 同註5，第370-371頁。
- ¹¹ 見《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報告》。
- ¹² 見《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報告》。
- ¹³ 見《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公報》。
- ¹⁴ 鄧小平：《我們對香港問題的基本立場》，載於《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12頁。
- ¹⁵ 鄧小平：《保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載於《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75頁。
- ¹⁶ 鄧小平：《會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的講話》，載於《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20頁。
- ¹⁷ 鄧小平：《要吸收國際的經驗》，載於《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67頁。